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卡尔·波普尔 编

延边教育出版社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作者:卡尔·波普尔

出版社:延边教育出版社

书号:ISBN 7 - 5437 - 2024 - 8

版权所有:北京焐子工作室

类别:哲学宗教

出版时间:2005 - 2 - 6

字数:26 万

内容提要:

历史的注解本书的基本论点是,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本书这个论点可以追溯到1919 - 1920 年冬天。它的基本大纲完成于1935 年前后;1936 年1 月或2 月,它作为一篇题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论文在布鲁塞尔我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勃朗塔尔家中举行的一次私人会议上第一次宣读过。在这次会议上,我以前的一位学生对那次讨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叫卡尔·希尔弗丁,不久他就成为盖世太保和第三帝国历史决定论迷信的牺牲品。出席者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其后不久,我在伦敦经济学院 F .A .冯·哈耶克教授的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类似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发表耽误了好些年,因为我投稿的那家哲学期刊拒绝接受我的稿子。第一次分三部分发表于《经济学》N · S .1944 年第11 卷,第42、43 期,1945 年第12 卷,第46 期,自从那时以来,意大利文译本(米兰,1954 年)和法文译本(巴黎,1956 年)相继以书籍形式问世。本版的正文已作了修改,并有若干补充。

卡尔·波普尔试图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证明,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 - - 不能产生任何结果的方法。但我过去实际上并没有反驳历史决定论。杜汝楫 邱仁宗/ 译序

历史的注解本书的基本论点是,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本书这个论点可以追溯到1919 - 1920 年冬天。它的基本大纲完成于1935 年前后;1936 年1 月或2 月,它作为一篇题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论文在布鲁塞尔我的朋友阿尔

弗雷德·勃朗塔尔家中举行的一次私人会议上第一次宣读过。在这次会议上,我以前的一位学生对那次讨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叫卡尔·希尔弗丁,不久他就成为盖世太保和第三帝国历史决定论迷信的牺牲品。出席者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其后不久,我在伦敦经济学院 F.A.冯·哈耶克教授的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类似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发表耽误了好些年,因为我投稿的那家哲学期刊拒绝接受我的稿子。第一次分三部分发表于《经济学》N·S.1944年第11卷,第42、43期,1945年第12卷,第46期,自从那时以来,意大利文译本(米兰,1954年)和法文译本(巴黎,1956年)相继以书籍形式问世。本版的正文已作了修改,并有若干补充。

我试图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证明,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不能产生任何结果的方法。但我过去实际上并没有反驳历史决定论。

在那时以后,我成功地对历史决定论给予反驳:我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

这个论证包含在1950年发表的《古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中的非决定论》一篇论文中。但是我现在又不再满意这篇论文了。在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的《跋:二十年以后》中讨论非决定论的一章,有更满意的论述。

为了让读者知道这些最近成果,我拟在这里简单谈谈我对历史决定论的这个反驳。我的论证可以概括为如下五个论题:

(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即使把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科学思想看作某种物质发展的副产品的那些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前提的正确性。)

(2)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这个论断可以由下面概述的理由给予逻辑的证明。)

(3)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4)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比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5)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的基本目的(见本书第11至16节)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

当然,我这个论证并不反驳对社会进行预测的可能性;相反,预测某些发展将在某些条件下发生,这个方法可以用来检验社会理论——例如经济

理论,这是同我的论证完全相容的。我的论证只是根据历史发展可以受到我们知识的增长影响这一点,来反驳对历史发展进行预测的可能性。

这个论证的决定性步骤是论题(2)。我以为下列的说法是令人信服的:如果有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这回事,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明天才会知道的事情。我认为这个推论是站得住脚的,但它还不是这个论题的逻辑证明。我在上述论文中提供的(2)的证明是复杂的:如果能找到较为简单的证明,我也不会惊异。我的证明在于指出了任何科学预测者——不管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部计算机——都不能用科学方法预测它自己未来的结果。只有在事后,这样做的尝试才能获得结果,但对于预测来说,就为时太晚了:只有当预测已成为追溯(retrodiction),这些尝试才能得出结果。

这个纯逻辑的论点适用于各种各样的科学预测者,包括相互配合的预测者"社会"。这意味着任何社会不可能科学地预测它自己未来的知识水平。

我的论证多少有点拘泥形式,所以即使它的逻辑有效性得到承认,它也会被认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然而,我已在两部著作中设法说明问题的意义。在后一部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我已从历史决定论思想史中选取若干事件,以证明这个问题对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持续而有害的影响。在前一部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现在第一次用英文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中,我力图证明历史决定论作为一种智力结构所具有的意义,我已试图分析它的逻辑——往往是如此深奥晦涩,如此咄咄逼人,如此容易骗人——并且我已经证明它有着固有的、无法弥补的弱点。

卡尔·雷蒙德·波普

1957年7月于白金汉郡,潘恩

一些最有眼光的本书评论家对它的标题表示困惑。这个标题意在暗示马克思一本书的标题《哲学的贫困》,后者又是暗示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

卡尔·雷蒙德·波普

1959年7月于白金汉郡,潘恩

导论

人们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科学兴趣比他们对宇宙学和物理学的科

学兴趣来得早一些；古代有些时期（我指的是柏拉图的政治理论，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制度论文集），社会科学似乎比自然科学更先进。但是由于伽利略和牛顿，物理学的成就出乎意料地远远超过所有其他科学；而且自巴斯德（生物学的伽利略）以后。生物学也已获得几乎同样的成功。但是社会科学尚未找到它们的伽利略。

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某门社会科学研究者非常关心方法问题；他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往往盯着那些日益繁荣的学科，尤其是物理学。例如，正是有意识地试图模仿物理学的实验方法而导致冯特时代的心理学改革；并且，从 J.S. 密尔以来，人们一再试图按照有点类似的路子来改革社会科学的方法。在心理学领域，这些改革也许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尽管还有许多令人失望之处。但是在理论社会科学中，除了经济学以外，这些尝试除了失望之外没有带来什么。在讨论这些失败时，人们就会立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物理学方法是否真的能用于社会科学呢？顽固相信物理学方法的可应用性的不正是造成这些研究处在非常可怜的状态的原因吗？

这个问题促使人们给那些对不怎么成功的科学方法感兴趣的思想学派加以简单的分类。根据他们对物理学方法可应用性的观点，我们可以把这些学派分为泛自然主义的或反自然主义的；如果他们赞成把物理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则称他们为“泛自然主义的”或“肯定的”；如果他们反对这些方法的应用，则称他们为“反自然主义的”或“否定的”。

一个研究方法的学者究竟是赞成反自然主义学说还是赞成泛自然主义学说，还是采取两类学说相结合的理论，这主要取决于他对所研究的学科的性质持什么看法，以及对这一学科的内容的看法。但是他采取的态度又取决于他对物理学方法的观点。我相信后一点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并且我认为，在大多数方法讨论中，关键性的错误在于对物理学方法的一些十分常见的误解。我尤其认为，这些错误起源于对物理学理论的逻辑形式、检验这些理论的方法、以及观察和实验的逻辑功能的错误解释。我的论点是，这些误解有着严重的后果；我试图在本书第 III、IV 部分证明这个论点。我要在那些部分阐明；反自然主义的和泛自然主义的各种不同的，有时彼此冲突的论证和学说，确实都在于对物理学方法的误解。然而，在 I 和 II 部分，我只限于解释某些反自然主义学说和泛自然主义学说，这些学说形成了这两种

学说都具有的一种特别的方法。

我建议首先说明这种方法,然后才加以批评。我把这种方法称为"历史决定论"。在讨论社会科学方法时常常遇到它;而且常常不加批判地使用它,甚至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我说的"历史决定论"是什么,我将在本书中加以充分解释。在这里我只需这样说:我说的"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 "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我深信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学说从根本上应对(除经济学以外的)理论社会科学那种不令人满意的状况负责,因而我对这些学说的介绍当然并非毫无偏见。但是我已努力提供支持历史决定论的理由,以便我尔后进行批判。我试图把历史决定论描述为一种考虑周到而结构严谨的哲学。而且我毫不踌躇地构思一些支持它的论据。据我所知,历史决定论本身从未提出过这些论据。我希望,这样我就成功地建立一种确实值得抨击的观点,换言之,我已使一个理论变得完善,人们常常提出这个理论,但是也许从来没有以充分发展的形式提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故意选用有点陌生的说法"历史决定论"。我希望通过引入这个说法,能避免有人在文字上吹毛求疵。因为我希望不会把任何人引向这样的问题:这里所讨论的论点是否真正完全或基本上属于历史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这个词的真正的、完全的或基本的意思是什么? I 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学说

历史决定论强烈反对社会学领域中的方法论自然主义,而声称物理学特有的某些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因为社会学与物理学之间有着深刻的差异。它告诉我们说,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都是始终有效的;因为物质世界受着在整个空间和时间之内不变的物质统一体的支配。然而,社会学规律,或社会生活规律则随着不同的地点和时期而有所不同。虽然历史决定论承认,有许多典型的社会条件,并且可以观察到这些条件有规律地一再发生,但它否认在社会生活中所发现的规律性具有物质世界规律性那种不变的性质。因为它们取决于历史,取决于文化上的差异。它们取决于特定的历史境况。例如,人们谈到经济规律时不应不加限定,而应该说封建时期的经济规律,或早期工业时期的经济规律等等,总要提到所说的

规律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历史时期。

历史决定论断言,由于社会规律具有历史相对性,因而大多数的物理学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学。这种观点所根据的典型的历史决定论论点涉及到概括、实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精确预测的困难以及方法论本质主义的意义。我将逐一讨论这些论点。

1 .概括

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在自然科学中,概括及其成功的可能性在于普遍的齐自然(uniformity of nature),在于观察到(也许不如说在于认定)在类似的条件下会发生类似的事情。这个原理被看作是在整个空间和时间内有效,据说它是物理学方法的基础。

历史决定论坚持认为,这个原理在社会学中必然是无用的。类似的条件只发生在单个历史时期内。它们决不会在时过境迁时还继续发生。因而社会中没有可以作为长期性概括的根据的那种恒久的齐一性 - - 其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那些平凡的规律性,例如下述的真命题:人类总是生活在集体之中,或某些东西的供应是有限的,而另一些东西如空气的供应是无限的,只有前者才能有市场价值或交换价值。

按照历史决定论者看来,忽视这种限制并试图概括社会齐一性的方法,无形中假定这些规律性是永恒的;因此一种在方法论上很幼稚的观点 - - 认为社会科学能够采取物理学的概括方法 - - 将造成一种错误的和可能误人子弟的社会学理论。这种理论会否认社会发展、或者否认社会总是发生重要的变化。或者否认社会发展(如果有的话)可以影响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律。

历史决定论者常常强调,在这些错误的理论后面通常有一种辩解的意图;而事实上,社会规律不变的假贫可能很容易被滥用于这些目的。首先,它似乎认为,由于不愉快或不合意的事情是由不变的自然法则决定的,所以必须加以接受。例如人们引用了经济学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来证明,用法律干预工资交易是无效的。滥用持久性假设的另一种辩解,助长了一种不可避免性的普遍感觉,从而使人容易安静而不加抗议地忍受不可避免的不

幸。现在的一切将会永远存在,试图影响事件的进程,甚或对它作出评价,都是荒唐可笑的。人们并不对自然规律提出异议,而企图推翻它们那就只能导致灾难。

历史决定论者说,这是保守的和为现实辩解的,甚至是宿命论的论点,是主张社会学应该采用自然主义方法的必然结论。

历史决定论者反对这些议论,认为社会的齐一与自然科学齐一迥然不同。社会的齐一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改变的。而人的活动正是改变它们的力量。因为社会的齐一不是自然法则,而是人为的;而且虽然可以说它们依赖人类的本性,它们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人类的本性有力量改变它们,而且也许能控制它们。所以人类能够使事情变得更好些或更糟些,积极的改革不一定无效。

历史决定论的这些倾向吸引着感到应该有所作为的人,尤其是感到应该干预人类事务并拒绝承认现有事态不可避免的那些人。趋向于有所作为并反对任何暗自满足的倾向,可以称之为"能动主义"。我将在第 17 和 18 节更多地谈论历史决定论与能动主义的关系;但我在这里援引一位著名的历史决定论者马克思的一句众所周知的劝诫,这句劝诫突出表达了"能动主义者"的见解:"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2 .实验

物理学运用实验方法;即它采用人工控制、人工隔离,以此来保证再现类似的条件及因此而产生的某种效应。这种方法的基础显然是,在条件类似的地方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历史决定论者声称,这种方法对社会学是不适用的。他争辩说,即使它是能够适用的,也不是有用的。因为,当类似的条件仅仅发生在某个时期内,任何实验结果只有十分有限的意义。而且,人工隔离正好排除了社会学中极其重要的因素。有的经济问题正是由于个人和集体在经济上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而鲁宾逊·克鲁索及其与世隔绝的个体经济决不可能成为这种经济的有价值模式。

历史决定论者进一步论证说,真正有价值的实验是不存在的。大规模

的社会学实验决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实验。它们不是为了促进知识本身的发展,而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这种实验不是在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离的实验室中进行的;相反,这种实验改变了社会的条件。由于进行第一次实验就改变了条件,这种实验决不会在完全相似的条件重复。

3 .新颖性

上述论点值得推敲。我已说过,历史决定论否认在完全相似的条件重复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可能性,因为第二次进行实验的条件必定受到以前进行的实验的影响,这种议论依赖于这样的观念:社会犹如有机体,它具有一种我们通常称之为历史的记忆力。

在生物学中,我们能够谈论某种有机体的生活史,因为有机体部分地受过去事件的制约。如果这种事件重复发生,它们对于有经验的有机体,就失去了新颖性,而带有习惯的色彩。然而这正是为什么重复事件的经验不是原来事件的经验之故 - - 为什么重复的经验是新的。所以,被观察事件的重复可能相当于观察者产生了新的经验。由于重复形成了新的习惯,因而产生了新的习惯条件。所以,我们对同一个有机体重复某一实验的全部条件 - - 内部的和外部的 - - 不可能十分相似而使我们能够谈论真正的重复。即使环境条件的完全重复也是与有机体中的新条件相结合的,因为有机体从经验中学习了。按照历史决定论看来,这也适用于社会,因为社会也有经验:它也有它的历史。社会只能缓慢地以它的历史(部分)重复中学习,但无可怀疑,从它部分地以它的过去为条件来说,它的确学习了。否则,传统和对传统的忠诚和怨恨、信任和不信任,就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所以,在社会历史中真正的重复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对出现性质全新的东西有思想准备。历史是会重复的 - - 但决不是在同样的水平上,如果所说的事件具有历史重要性,如果这些事件对社会有着持久的影响,就更是如此。

在物理学所描虚的世界中,不可能出现真正全新的东西。人们可以发明一部新发动机,但我们总可以把它作为原有要素的重新组合来加以分析,物理学中的新只是排列或组合的新。历史决定论坚持认为,社会的新则完

全相反,如同生物学的新一样。是一种内在的新。它是真正的新,不能归结为组合的新。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同样的旧因素在新的排列中决非真正是同样的旧因素。在社会生活中,一切都不可能完全重复,而必然出现真正的新事物。历史决定论认为这一点对于考虑历史新阶段或新时期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每一个阶段或时期内在地不同于任何其他阶段或时期。

历史决定论声称,没有比出现真正的新时期更为伟大的时刻。我们对物理学新情况的解释是把它们视为原有因素的重新排列,但对于社会生活这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却不能按照我们在物理学中这个习惯的路子来加以研究,即使普通的物理学方法可以适用于社会,但决不会适用于最重要的特点:社会划分为各个时期并出现新情况,一旦我们理解社会新事物的意义,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样的想法,即把通常的物理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学问题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发展问题。

社会的新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已看到,每一特定的社会事件,社会生活中每一件事,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新的。它可以和其他事件归入一类;它可能在某些方面类似那些事件;但它在某一个十分明显的方面总是独特的。就社会学解释而言,这导致了显然不同于物理学的情况。可以设想,通过时社会生活的分析,我们也许能够发现和直观地理解,任何特定的事件如何发生和为什么发生;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它的原因和结果 - - 使它发生的那些力量和它对其他事件的影响。然而我们发现,我们不能提出普遍规律,不能用普通名词来描述这种因果联系。因为它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社会现象,而我们所发现的特殊力量则能对这种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这些力量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也许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境况中只出现一次,而不再出现。

4 .复杂性

刚才概述的方法论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人们十分经常讨论的一个方面(这里不拟讨论)是某些独特的人物的社会作用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在物理学中我们处理的课题则简单得多;尽管如此,我们还要用实验隔离方法人工地使问题简化。由于这种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学,我们

面临双重的复杂性 - - 不能进行人工隔离而产生的复杂性,以及下列事实造成的复杂性,即社会生活是以个人的精神生活即心理为条件的自然现象,而心理学又以生物学为条件,生物学又以化学和物理学为条件。社会学在学科系统中排在最后,这一事实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涉及社会生活的因素是极端复杂的。即使有不变的社会学齐一性,象物理学领域中的齐一性那样,但由于这两重复杂性,我们完全不可能发现它们。如果我们不能发现它们,那就没有什么必要认为它们依然存在。

5 .预测的不精确性

在讨论历史决定论的泛自然主义学说时将表明,历史决定论往往强调预测作为科学任务之一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历史决定论,即使我并不认为历史预言是社会科学的任务之一。)然而,历史决定论争辩说,社会预测必定是十分困难的,不仅由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而且由于预测与被预测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引起的某种特殊的复杂性。

预测可影响被预测事件这种看法是十分古老的。传说中的俄狄普斯杀了他以前从未见过面的父亲,这是一个预言的直接结果,这个预言曾使他父亲把他抛弃。所以我建议把预测对被预测事件的影响(或者更一般他说,某条信息对该信息所涉及的境况的影响)称为"俄狄普斯效应"。这种影响或者会引起被预测的事件,或者会防止这种事件的发生。

历史决定论者最近指出,这类影响可能与社会科学有关,它可能增加作出精确预测的困难,而有损于它们的客观性。他们说,假定社会科学能够如此发达,以致可以对任何社会事实和事件作出精确的科学预报;但是从这种假定会得出荒谬的结论,所以根据纯粹的逻辑理由就可以反驳这样假定。因为,如果新制订了这样一种科学的社会日历,并且为人所知(由于它在原则上能够由任何人重新发现,它不可能长期保密),它肯定会引起扰乱预测的行动。例如,假设人们预测股票行市三天看涨,然后看跌。显然与市场有联系的每个人都会在第三天抛售股票,这造成了当天股票行市下跌,从而否证了这个预测。简言之,精确而详尽的社会事件日历这种观念是自相矛盾的:所以精确而详尽的科学的社会预测是不可能的。

6 .客观性和评价

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决定论在强调社会科学中预测的困难时所提出的论点,是基于预测对被预测事件的影响的分析。但是,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在某些条件下,这种影响可以对作出预测的观察者有重要的反作用。类似的考虑甚至在物理学中也是有的,在物理学中,每一次观察都基于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能量交换,从而导致物理学预测中通常可以忽略的不确定性,即所谓"测不准原理"。

坚持这种不确定性是由于观察客体与观察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致;这是可能的,因为二者均属于同一的作用和反作用的物质世界。正如玻尔指出的,物理学中的这种情况,在其他学科中,尤其在生物学和心理学中有类似之处。但是科学家及其对象属于同一个较大的世界这一事实,在社会科学中是没有的,这导致社会科学中(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预测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有时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在社会科学中,我们面临着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充分的而复杂的相互作用。觉察到一些可能产生某一未来事件的倾向,进而觉察到预测本身可能影响被预测事件,这很可能对预测的内容有反作用;并且这些反作用也许严重损害预测的客观性以及社会科学的其他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一个预测就是一种与其它社会事件相互作用的社会事件,其中包括与它所预测的社会事件的相互作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预测可以促使这个事件的发生;但不难看出,它也可以从其它的方面影响这个事件。在极端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引起它所预测的事件。因为,如果没有预测该事件,也许它本来就根本不会发生。在其相反的极端情况下,对即将来临的事件的预测可导致防止该事件的发生(因此可以说,社会科学家能够通过故意地或不经心地不去预测它,来使之发生,或引起它发生)。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显然会有许多中间情况。预测某件事的行动,以及不去作出预测的行动,都会有种种后果。

显然,社会科学家必须及时知道这些可能性,例如,一位社会科学家预

测某件事,预知他的预测将引起它发生。或者他否认某种事件可以预期发生,从而阻碍它的发生。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也许都遵守科学客观性的原则,因为他的确说的都是实话。但是,尽管他说了实话,我们也不能说他遵守了科学客观性;因为在作出预报(预报某事件将实现)时,你可能是按照他个人的喜好来影响那些事件。

历史决定论者可能承认,这种情况多少是特意安排的,但是他将坚持认为,这种情况显然在社会科学的几乎每一章中都有。科学家的意见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几乎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境况,在这种境况中,我们不仅必须考虑意见的真实性,而且必须考虑它们对未来发展的实际影响。社会科学家也许正在努力发现真理;但同时他也必定总在对社会施加一定的影响。他的意见确实起作用这个事实本身就破坏了意见的客观性。

我们迄今一直认为社会科学家确实努力发现真理,并且纯粹为了发现真理;但是历史决定论者会指出,我们所描述的境况给我们的假定造成困难。因为只要偏爱和兴趣对科学理论和预测的内容有这种影响,则能否判定和避免偏见就很成问题。因此在社会科学中几乎没有类似我们在物理学中遇到的那种对真理的客观的和理想的探求,就不足为怪了。我们必须预期在社会科学中尽量发现社会生活各种趋势;尽量发现各种立场和兴趣。人们可以提出疑问:历史决定论的这个论据是否导致极端的相对主义,以致认为社会科学中只有成功——政治上的成功——才是重要的,而客观性和真理的理想全都不能应用。

为了证明这些论点,历史决定论者可以指出,只要社会发展中某一个时期具有某种固有倾向,我们就可期望发现能影响这种发展的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科学起着助产士的作用,帮助产生新的社会时期:但是在保守派手里,它同样能用来为阻碍即将发生的社会变革服务。

这种观点可能给人们提出,如果参照各种社会学说和学派与它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中普遍存在的预测和旨趣之间的联系(这种方法有时称为"历史主义",而不应把它同我所说的"历史决定论"相混淆),或者参照它们与政治的、经济的或阶级利益之间的联系(这种方法有时称为"知识的社会学"),就能够对这些学说和学派之间的区分给予分析和阐明。

7 .整体主义

大多数历史决定论者相信,自然科学方法之所以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还有更深刻的缘由。他们争辩说,正如所有"生物"科学,即涉及生命体的科学一样,社会学的研究不应采用原子主义的方式,而应采用现在称之为"整体主义的"方式。因为社会学的对象(社会集团),决不能被视为只是个人的集合体。社会集团,不仅仅是其成员的总和也不仅仅是在任何时刻在其任何成员之间存在着的个人关系的总和。甚至在三个成员组成的简单集团中,也容易看到这一点,由 A 和 B 组成的集团在性质上不同于由同样数目的成员 B 和 C 所组成的集团。这可以表明,人们说一个集团有它自己的历史,而它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它的历史(参阅上面第三节论"新颖性"),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集团失去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成员,它仍然能容易地保持其性质完整无损。甚至可以设想,即使一个集团的全部原先成员被其它成员所取代,它仍可以保持其许多原有的性质。但是,如果现在构成这个集团的这些成员不是一个接一个地加入原先的集团,而是成立了一个新的集团,他们本可以建立一个十分不同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的个性对集团的历史和结构可能有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这个集团具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结构:更不妨碍它对其成员的个性产生强烈的影响。

所有社会集团都有它们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建构(institutions)、自己的仪式。历史决定论声称,如果我们要理解和解释集团的现在,并且如果我们要理解也许还要预知集团未来的发展,我们就必须研究集团的历史,研究它的传统和建构。

社会集团的整体性质(即这种集团决不能完全解释为它们成员的单纯集合),说明了历史决定论者关于物理学中的新事物(只是原有要素和因素的新组合或新排列)与社会生活中的新事物(不可归结为纯属新排列的那种真正的新事物)之间的区别。因为如果社会结构一般不能被解释为它们的各个部分或要素的组合,那末,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新的社会结构显然绝不可能。

另一方面,历史决定论坚持认为,自然结构可以解释为纯粹的"构象",

或仅仅是它们各部分及其几何构形的总和。以太阳系为例;虽然研究它的历史是有趣的,并且这种研究有助于说明它的目前状态,但我们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状态与这个系统的历史无关。这个系统的结构,它的未来运动和发展,完全取决于其成员目前的构象。只要知道任何一个时刻其成员的相对位置、质量和动量,则就完全可以确定了该系统的未来运动。我们无需再知道哪一颗行星更老些,或哪一颗是从太阳系之外被带入该系统的。结构的历史虽然也许是有兴趣的,但对我们理解它的运动,它的机制以及它的未来发展却毫无帮助。显然,自然结构在这方面与任何社会结构迥然不同:即使我们对社会结构在某个时候的"构象"十分了解,但是如果对它的历史没有仔细的研究,则我们既也不能理解它,也不能预测它的未来。

这些考察有力地表明,历史决定论与所谓社会结构的生物学理论或有机理论(把社会和活机体类比来解释社会集团的理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据说整体主义的确具有一般生物现象的特征,而且在考察各种有机体的历史如何影响它们的行为时,整体主义方法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历史决定论的整体主义论证往往强调社会集团与有机体之间的相似性,虽然它们不一定导致接受社会结构的生物学理论。同样,认为存在着某种集团精神(作为集团传统的载体)这个著名学说,虽然其本身不一定是历史决定论的一部分,但与整体主义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8 .直觉悟性

迄今我们主要讨论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征的方面,例如新颖性、复杂性、有机性、整体主义以及把历史划分为各个时期;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某些典型的物理学方法是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这些方面的。所以,认为在社会研究中采取一种对历史学较适用的方法是必要的。我们必须设法直觉地认识各种社会集团的历史,而这正是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观点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有时发展为与历史决定论关系密切的一种方法论学说,虽然这种学说并非总是同历史决定论结合在一起的。

这种方法论学说认为,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相反,社会科学的特有方法则是基于对社会现象的深入认识。人们通常强调下列的对立和对照与这种学

说有关。物理学的目的是解释因果关系;而社会学的目的则是理解意旨和意义。在物理学中,可惜助数学公式对事件作出严格的定量说明。社会学则试图较多地从性质上去认识历史的发展,例如用冲突的倾向和目的,或用"民族性"或"时代精神"来理解历史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物理学运用归纳的概括,而社会学则只能借助联想。正是由于这个理由,物理学能够达到普遍有效的齐一性,并把特殊事件解释为这种齐一性的实例,而社会学则只能满足于直觉地领悟发生于利益、倾向和命运的特定斗争中的独特事件及其在特定情况中的作用。

我建议区分直觉悟性学说的三种不同的变式。第一种变式断言,如果对引起某一社会事件的力量进行分析,即如果知道有关的个人和集团,知道他们的目的或利益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力量,就能认识这个社会事件。在这里,个人或集团的行为被理解为符合他们的目的——即扩大他们的实际利益或至少是他们想象的利益。在这里,社会学方法被认为是用想象来推测具有一定目的的理性的或非理性的活动。

第二种变式走得更远。它承认这种分析是必要的,尤以认识个人的行动或集团的活动为然。但是它认为,要认识社会生活,这种分析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要认识某个社会事件的意义,例如某个政治行为的意义,那么,光靠目的论的方式是不足以认识它是如何和为什么引起的。除此以外,我们必须理解它的意义,即它的发生的重要性。"意义"和"重要性"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从我所说的第二种形式的论点来看,回答是:某个社会事件不仅产生某些影响;也不仅迟早导致其他事件,而且它的出现本身就改变许多其它事件的境况值(situational value)。这个社会事件创造了一种新的境况,要求在该特定领域内对所有对象和所有行为进行重新定向和重新解释。比方说,为了理解在某一个国家中建立一支新军队这个事件,就必须分析意旨和利益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不分析这种行动的境况值,我们就不可能完全理解其意义和重要性:例如,另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在此之前一直完全能保卫自己,而现在也许已经很不够了。简而言之,甚至在进一步发生任何实在的变化(物理变化或心理变化)以前,整个社会境况也许已经改变了;因为当有人注意到境况变化时,它有可能早就变了。因此,为了认识社会生活,我们不能只限于分析事实上的原因和结果,就是说不能只分析动机,利益和行动

所引起的反应;我们必须懂得每一个事件在整体中有着某个待定的作用。这个事件由于它对整体的影响而获得它的意义,所以它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整体来决定的。

直觉悟性学说的第三种变式,不但完全承认第一和第二种变式所坚持的一切,而且甚至走得更远,它认为,为了认识某一社会事件的意义或重要性,仅仅分析事件的起因、结果和境况值是不够的。除了这样一种分析以外,必须分析那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根本的客观历史趋势和倾向(例如某种传统或权力的兴衰),还必须分析该事件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而这个历史进程又促使这种趋势的出现。例如,要完全理解德雷法斯案(Dreyfus Affair),除了分析它的起因、结果和境况值之外,还要求透彻了解这是在法兰西共和国发展过程中两种历史倾向(民主和贵族,进步和反动)之间的斗争的表现。

直觉悟性方法的第三种变式强调历史的趋势或倾向,认为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从一个历史时期推出另一个历史时期的类比推理。虽然它完全承认各个历史时期有着内在的差异,并且承认任何事件都不可能在另一个社会发展时期重复,但它可以承认类似的倾向可以在不同的也许相差很远的时期中都占支配地位。有人认为,这种类同或类似是存在的,例如亚历山大以前的希腊和俾斯麦以前的南德意志之间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直觉悟性方法认为,我们应该把某些事件与早期类似事件相比较来评价它们的意义,以便帮助我们预测新的发展——然而,决不能忘记,必须充分考虑到两个时期之间的必然差异。

因此,我们看到,理解社会事件的意义的方法必须远远超越因果解释。它在性质上必定是整体主义的;其目的必定在于确定该事件在某一复杂结构之内——在某一整体之内所起的作用,该整体不仅包括当代的部分,而且包括时间前后相继的短期发展阶段。这可以解释何以直觉悟性方法的第三种变式往往借助于有机体与集团的类比,何以往往采用例如时代精神那样的观念,认为它是所有那些历史倾向或趋势的源泉和监督者,对判定社会学事件的意义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直觉悟性方法不仅与整体主义观念相符,它与历史决定论者强调新颖性也十分一致。因为新颖性不能给予因果解释或理性解释,而只能直觉地